

少年司法新典範的轉移： 論復歸式正義觀點的轉向制度

陳祖輝

壹、前言

「轉向」(diversion)是近年來少年司法、矯正體系的重大變革，其基本意涵係指降低正式司法體系之干預，而直接由執法人員將偏差／犯罪少年轉介至其他非司法的部分，減少機構處遇所造成的負面烙印效果(楊士隆與林健陽，2001：372)。世界各國的少年轉向計畫大致不脫離以社區、學校、社會福利資源來實施相關的庇護工作。在庇護的過程裡，我們除了關心如何矯正少年的偏差行為與觀念之外，至於如何承擔未來的責任與如何再面對受害者這方面，似乎是著墨太少，2005年1月在新竹縣新豐鄉一名甫自矯正學校出來的少年，他犯下駭人聽聞的姦殺案便是一例。當前全世界的少年司法，一直處在：懲罰與處遇，這兩個對立取向觀點之上在搖擺著。近十年隨著少年犯罪低齡化快速成長的趨勢來看，許多國家，如：英國和日本，不得不修正少年刑事政策，開始下探到懲罰青少年階段的違犯者。反觀我

國，基於少年保護、教育的立場，目前仍選擇容忍少年犯罪；目的不外再多給青少年朋友自新的機會，避免淪入被貼上「負面標籤」的命運。但是，無論是採懲罰取向的少年司法？抑或是教育處遇為主的少年司法？基本上，當面對：修正社區、被害者、加害者與家庭這四者間的關係需求時，懲罰與處遇的作法在滿足各方的期待與需求之上，嚴格來說，對真正解決問題，只不過是「鳳毛麟角」而已！因此，西方許多國家開始思考少年司法的未來走向時，他們一致認為，及早介入處遇，以及尋求：加害者、被害者與社區這三方利益與權利上的平衡，是其典範轉移的努力目標(Seymour & Gregorie, 2002)。

貳、少年司法的典範轉移：修復型的少年司法興起

「修復型」的少年司法(restorative juvenile justice)是立基在復歸式正義，著眼於：修復傷痛(repairing harm)、排解衝

突 (resolving conflict)，而不是用於處罰加害者之上的一種實踐。西方社會自 1970 年起，開始瀰漫著：不滿應報式司法、被害者權益獲得重視、公民參與運動、司法多元主義、社區警政與社區非正式司法運動等風氣 (莊忠進，2003：57—60；Galaway 與 Hudson，1996)，修復型的少年司法強調公共的問題解決 (public problem-solving) 與公民的積極參與司法過程等作為被視作為建構一種「共信」(communitarianism) 社會的團體意識而準備 (Galaway & Hudson，1996：44)。一個具有「共信」的社會是指一個團體中有著高度互助、互賴與互信的社會網絡，個體願意捐棄個人主義的利益，對團體的忠誠重於個人的權宜性便利。在這樣的社會裡，人與人因為彼此間的緊密互信互賴，進而激發高度的羞恥心與責任感，願意朝向再整合彼此與團體間的關係而努力。此時少年司法不再是象徵著發生在一座嚴肅的法庭殿堂那般的事務，它可以發生在任

何一個社區、社會福利機構、警察局、學校或適當的集會場所等，透過對話與調解的手段進行每一個環節所發生的事情。這類的司法過程裡，沒有絕對審判權力的法官，有的是：協調者 (警察、觀護人、諮商專業人士、社區領導者、老師、法官)、加害者、被害者這三方的互動關係，他們所要討論的議題內容分別是：(Galaway & Hudson，1996：45)

一、犯罪的本質該如何界定？

二、誰應該讓司法體系來服務？如何讓案主進入這個司法體系？

三、如何讓司法體系滿足案主的基本需求及面臨一般社會的期待？

四、專業協調者應如何完成當一般公民、加害者、被害者互相面對面時的角色扮演功能？

根據上述四點，在修復式少年司法內，每一個參與者的角色扮演，參考 Bazemore (1996：57) 的看法綜整如下表一所示：

預期目標 參與對象	透過苛責來產生約束力	透過能力培養來修復關係	提升公共安全
加害者	1. 實際從事回復受害者與社區的損失 2. 必須面對被害者或其代理人	1. 在社區內實際參與如同提供資源性的角色扮演，藉此改善其生活品質 2. 為了有積極作為，提供相關產製資源如：新的經驗、技術、自我肯定學習	1. 參與在被授與權限的場所，進行復歸式的均衡計畫 2. 發展具有內在控制、新同儕關係與組織性的承諾

被害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積極參與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 2.提供關於心理狀態的文件以及受到犯罪衝擊的情緒感受 3.在自願的基礎上參與調解 4.協助決定對加害者提出制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提供輸入需求進入修復過程 2.建議社區提供給加害者的服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提供加害者面對社區所需的持續性安全關懷、恐懼與控制行為 2.對於其他被害人鼓勵提供保護性的支持
社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如同協調者的參與性角色 2.發展社區服務與提供支薪工作機會給加害者，藉以承擔賠償之責 3.承擔完全的責任來協助被害人與接納支持加害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對於少年培養其新機會來提供生產性的貢獻 2.營造少年承擔責任的能力與發展社區的歸屬感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提供少年司法體系對少年的監護關係與顧問指導 2.發掘社區底層的少年偏差問題，產生預警效果
少年司法專業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促進調解工作進行 2.擔保修復過程得以發生 3.發展創造性／復歸的社區服務選擇 4.激勵社區成員參與調解過程 5.教育社區居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對於少年犯發展新的角色，允許他們參與實踐和展示培力 2.在少年與社區的能力之內確認賠償範圍 3.發展社區的伙伴關係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發展加害者承諾於監督管理者所要兌現結果的範圍 2.協助學校與家庭，藉助他們之力來維持並監控少年的行為 3.發展當地組織性的預防能力機制

參、復歸式正義的歷史緣起

歷史上，復歸式正義的發展曾經沉寂一時，離最近開始有系統記載的時期是1980年初期的英國，然後隨即擴散到北美洲的加拿大與美國，之後又有南半球的紐西蘭與澳洲加入，才使得復歸式正義成為

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在美國，特別是南方各州，直到19世紀中葉，社區在定義它的價值與行為規範時，仍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衝突或罪（sin）的解決，通常是利用宗教集會時，透過當面解決問題（confrontation）、承認（confession）錯誤，祈求社區寬恕、諒解，冀能重新復歸於社

區(莊忠進, 2003: 56)。根據 Llewellyn & Howse (1999) 認為, 復歸式正義並不是「新一波」的社會運動。它其實是回歸到傳統的西方與非西方世界在人類歷史上早已存在處理犯罪和衝突的模式。事實上, 應報懲罰思想影響與支配西方的犯罪問題和刑事司法系統而言, 其實僅僅少數幾世紀而已。復歸式正義的出現早先於應報式正義, 它同時被記載於社群正義時代(人類有部落時期)(Zehr, 1995); 在呈現正義方面, 它是屬於風俗習慣與土著化的取向。同時, 它又類似介於社群正義強調化解爭執的過程與傳統重視治癒作為之間。遲自 1066 年起, 始出現以國家為主導的刑事司法體系, 將追訴犯罪的權限歸屬於國家, 被害人在訴訟中的地位, 幾乎完全被忽視(Evans, 1998; 莊忠進, 2003: 57)。一般而言, 復歸式正義的歷史演變主要可以分為四大時期:(許春金, 2002)

一、無首領社會的復歸式正義時期

根據 Michalowski 的說法, 無首領社會主要是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組織, 該社會強調集體責任的概念, 因此, 個人非常強烈地依附在團體, 也大大減少了衝突的可能性, 同時提高順從性(conformity)。如果有衝突或問題發生, 則雙方會評估衝突所造成的損害, 再決定要如何處理加害者或被害者, 以使雙方再回復平衡。而其處理衝突的方式則有:(一)血親復仇(blood revenge)、(二)應報(retribution)、(三)儀式滿足(ritual satisfaction)、(四)補償(restitution)

等。其中與復歸式正義最相關的是: 儀式滿足與補償。儀式滿足是要求加害者象徵性地認罪, 接受公共的譴責或是形式上的損傷, 以滿足被害正義需求的情感。補償方面, 是公認最常用以解決紛爭的方式, 以使雙方迅速回復正常的關係。以亞馬遜河的「坎尼拉」部落社會為例, 有關傷害、殺人、性侵害等罪名通常會由部落長老「祭司」討論該如何處理紛爭, 大部分最後裁決均傾向以「牲禮」(補償一定頭數的豬、牛、羊)作為補償被害者的方式。

二、早期國家社會的補償制度時期

就西方的法制史而言, 復歸式正義的精神, 可以遠溯到西元前 2060 年的 Ur-Nammu 法典。Weitekamp 指出, 早在漢摩拉比法典(2380B.C.)即將補償制度局限規定於財產犯罪(也有代替死刑的案例)。羅馬十二木表法規定: 竊盜犯罪者應該賠償所偷東西兩倍的價值。西元 600 年的日爾曼部落法(Germanic)規定, 對於暴力與非暴力犯罪者命令其賠償(莊忠進, 2003: 57)。此外, 早期的希伯來人將復歸式正義的補償制度運用於人身犯罪的部分, 公元 500 年到 1100 年左右, 安格魯薩克遜(Anglo-Saxon)的法律允許對殺人犯罪判以金錢的罰鍰。一直要到中古世紀後期, 死刑才成為殺人犯罪的唯一懲罰。而 Schafer 也指出, 印度教的社會奉行「補償者得到原諒」的信條。

三、本世紀以來的補償制度時期

自從 12 世紀的末期, 復歸式正義的刑

事司法制度幾乎完全被當前應報式刑罰觀念所取代。國家權力集中化的結果，極權的君主乃有設計刑事法用以控制人民行為。因為應報式的刑事法強調「懲罰」，導致被害者補償的權益總是擺至懲罰之後；更有甚者，被害者及其家屬連一毛都拿不到（因為加害者入獄或遭到死刑處分）。儘管如此，古典學派學者，如：貝加利亞（Beccaria）及費利（Ferri）等人即認為罪刑均衡原則，同時主張應放棄殘忍的死刑政策，強調自由刑的重要性，例如：貝加利亞認為對於竊盜，因其以他人的損失來滿足自己，就應以罰款做為懲罰，以其損失來補償，若無力償還，則可藉由暫時的勞役加以懲罰。費利則主張，國家疏於保護被害人的權利，且必須補償被害者所受的損害。

四、和平創建的復歸式正義時期

在 1980 年末期，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授 Hal Pepinsky 首度揭櫫「和平創建」（peacemaking）概念，並用以作為了解「犯罪人」與「社會」之間鴻溝的橋樑。Pepinsky 認為，處理犯罪問題僅有兩種取向觀點：（一）和平創建（peacemaking）、（二）壓制處置（warmaking）；而現今社會面對犯罪問題均採以「壓制處置」方式。和平創建的觀點則改善壓制處置對加害者的「責難」及「缺點」指明，取而代之的是，強調「被害者—加害者」關係的「大和解」，營造一個回復到具有：和平、問題解決取向與關係修復（加害者、被害者、社區）等特色

的情境。最後所要爭取「復歸」的「正義」有三：關係式的正義（relational justice）、實質正義（positive justice）與再整合性正義（reintegrative justice）（Marshall, 1997）。所謂的「關係式的正義」係指有別於過去傳統刑事司法正義的處置過程，並強調建構一實質關係（非法律介入的關係）的正義。「實質正義」則說明正義的實現必須是：由當事人團體（eponymous group）倡導將「刑罰」（punishment）為自我目的導向的觀點移除後所建構的正義取向觀點。「再整合性正義」這個觀點源自於學者 Braithwaite（1989）之「再整合性羞恥」理論當中，主要強調在協商式的家庭會議裡，如何讓加害者激發自我的羞恥心，並願意表達道歉悔意、承擔補償責任，同時接受被害者與社區關心者之諒解等過程。

肆、復歸式正義少年司法的核心價值與實務型態

一、核心價值：和平創建

（peacemaking）與重視人權

一般來說，「應報式正義」所聯想的核心概念是：「懲罰」（punishment），相異於「應報式正義」的「復歸式正義」則著重於：「調解」（mediation）、「補償」（restitution）、「擔負責任」（accountability）。談及「復歸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又稱修復式正義）一詞，Howard Zehr 認為，首先復歸式正義強調三個不同的問題：一、甚麼樣的損害起因於犯罪？二、甚麼是需要被視為「做

對的事」(make it right)或需要修補傷害(harm)?三、誰有責任從事修補傷害?基本上,復歸式正義著重「關係」之維繫及協商,此一「關係」,主張:犯罪所造成的結果是對人際間(被害人—加害者)、社區乃至整體社會的一種「社會損害」(social harm)。復歸式正義的做法有別於傳統應報式主義,它強調的是:社會的衝突面向而非違反「法律觀點」、著重修補損害的一種「關係式正義」、建立和平創建(peacemaking)的對話與協商機制、重視被害人、加害者與社區三方面關係損傷的事實、重視被害者的聲音與權益、鼓勵加害者擔負應有的補償責任等條件的參與。所以它是一種將:被害人、加害者、社區三方面「帶入」(bring into)非敵意討論情境的理念策略(陳祖輝,2003)。職是之故,Tony Marshall(1997)為復歸式正義下了這樣的定義:「復歸式正義是一項特殊犯行的所有利害當事人共同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未來的過程」。Bazemore & Walgrave 則將復歸式正義更簡單地界定為:「任何主要目的為回復犯罪所造成的損害之活動,均稱之」。Pranis(1997)認為,復歸式正義是一種「和平創建圈」(peacemaking circle),它的目的在於治癒加、被害雙方的關係;同時,主要建立在幾點重要基礎之上:尊重每一個人、信任感、對協調結果的認同、開放地傾聽被害者的痛苦與了解受害經驗對其影響。

美國在1996年召開全國矯正電訊會議,該會議的專門研究小組為復歸式正義

訂下了7個主要的核心價值,如下:
(Seymour & Gregorie, 2002)

- (一)犯罪是一種侵犯人際關係的犯行。
- (二)被害人與社區應被視為是司法過程的主要核心對象。
- (三)司法處理過程的第一優先順序是協助受害者。
- (四)司法處理過程的第二順位是盡可能地修復與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
- (五)加害者在犯罪後應對被害人與社區負起個人的責任。
- (六)基於復歸式正義的精神,加害者將培養修補自我缺陷的能力。
- (七)契約監督者為了達到復歸式正義的精神目標,採伙伴關係的行動方式與加害者一起承擔責任。

二、實務型態

(一)調解

調解,基本上需要中立的第三人團體(受有訓練的社區自願者或社工人員)在加害者與被害人之間進行對話上的調解。在1971年美國紐約的曼哈頓地區開始為刑事調解訂立標準。此時,調解過程中,雙方父母親或相關親友必須出席調解場合。調解者具備有傾聽的技巧,例如:眼神專注、摘要參與者的講話重點、確認加/被害雙方彼此的共識與討論。茲介紹相關實務類型:(McCold, 2001: 41)

1.社區調解(Community Mediation)

社區調解計畫主要是由社區爭議調解中心(類似我國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來

執行，並附屬於法學院、法庭服務與相關公家的基金會。他們承接的個案大部分是來自於警方、檢察官、觀護人或未經預約自行申請等。基本上，屬於輕微的案件，如：偷竊、傷害、破壞公物、公共危險罪等大部分都會轉介到社區調解計畫內來執行。以美國來說，大部分的調解者均具備專業背景，就算是自願擔任調解工作的人也需要接受調解技巧訓練後才可以執行該項工作。調解者不在當事人雙方之間替他們做決定，但是在協商失敗之際可以提供多元選擇方案供其考慮。

2. 受害者與加害者調解計畫 (Victim 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

該計畫肇始於 1974 年安大略的 Kitchener 市，從事於傷害治癒與回復被害者的權益。協調者居間鼓勵雙方參與調解活動，藉由協助雙方良性溝通與確保場面安全之下，規範互動的遊戲規則。該計畫主要內容即被／加害者雙方及其利害關係人（團體）共同聚集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會面，並進行與犯罪事件有關之結構性討論的過程。討論過程中，需要由一位專業訓練的協調者（mediator）負責召開討論會議，被害者在此過程中得以讓加害者知道犯罪所造成的身體、精神與財物的損害，並且接受他們的詢問；進而發展出制定一套由加害者財力方面的補償計畫。加害者必須在過程中透過「對話」（dialogue）機制，表達願意負起犯罪行為應有的責任，並完全同意接受未來的補償。該計畫最後所做成的協議在法院審理時進一步作為判

決之參考（陳祖輝，2003：73）。

(二) 會議

一般而言，以社區會議進行協商時，主要可區分成兩大賠償類型（Retzinger & Scheff, 1996：316—318）：物質性賠償與象徵性賠償。物質性的賠償係指加害者承諾實際的金錢或物品賠償，或是透過社區服務來贖罪。象徵性賠償在會議當中被視為是一個重要「受尊敬的社會儀式」。加害者必須提出口頭的道歉，姿態上表現出謙卑有禮；讓被害者暢所欲言，表達內心的傷痛與感受，並且鼓勵雙方情緒抒解與解放。最後，期望被害者可以接受加害者的道歉並決定寬恕其犯行。以下將簡介各種會議的實際運作內涵：

1. 紐西蘭家庭協商會議 (Family Group Conferences)

1989 年紐西蘭政府頒布「兒童、少年暨其家庭法」，明文確立家庭協商會議的法定地位。適合該會議的基本條件規定是：少年犯行已被確立、少年未否認其犯行，以及該犯罪只要不涉及謀殺或一般殺人罪的指控均可。同時，少年法庭不可以對適合參與會議條件的少年在尚未參加會議之前就予以宣判罪刑。該會議參與者除了加／被害雙方、少年法庭協調者之外，雙方家屬、承辦警察、親友或家屬期盼出現的適合人選（如：律師、教師、牧師或地方仕紳）等，均可共同參與會議討論，並決定最後賠償與懲罰的結果（L. Thomas Winfree, 2004：197；McCold, 2001：45）。

2. 澳洲 Wagga Wagga 會議 (Conferencing)

in Wagga Wagga)

1991 年該會議早在澳洲新南威爾斯的 Wagga Wagga 被納入社區警政的一環，它的誕生基本上是受到紐西蘭家庭協商會議的影響。澳洲著名犯罪家 Braithwaite (1989) 所提出的「明恥整合理論」(theory of reintegrative shaming) 才是背後最主要的理論啓蒙源頭。該會議與其他地方的協商會議大同小異，仍不脫離討論犯罪過程的發生，以及思索如何協助加／被害雙方走出敵意的情緒，積極開拓責任賠償的可能。其中，該會議最殊地方在於會議的協調者是由警察擔任，並由警察來主導整個會議進行及監督加害者承諾的兌現完成。

3. 北美社區社團會議 (Community Group Conferences)

該會議是一個以「特殊案件導向」(incident-focused) 性質為主的協商會議，同時它可以是在各種公開場合，如：學校、工作場所、社區、少年社團組織與大學校園內發生，會議形式與程序大體上與其他的協商會議雷同。以加拿大為例，該國於 2003 年通過「新少年刑事司法法案」(The new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即強調未來將擴大以社區導向來回應少年犯罪 (Hillian, Retitsma-Street & Hackler, 2004)。

(三) 互動圈

「互動圈」(Circles) 的概念源自傳統土著文化內排解糾紛的社會儀式過程裡，通常是由部落內的長老們經過討論後，點

頭達成協議之後，以賠償物品當作最後和解的手段。當然，過程中為了促進部落原有的凝聚力，透過情緒上的抒發與排解可以迅速幫助被害人走出陰霾；最後，衝突雙方言歸於好，一起快樂地高歌起舞，和好再相愛。相關實務型態介紹如下：

1. 納瓦伙印第安族的司法 (Navajo Justice)

傳統上納瓦伙印第安族的司法習俗是用於排解衝突，它的內在意涵是建立在部落的「Hozhooji」這個概念之上（意思指的是活在健全的人際關係之中）。該部落的司法處理過程充滿了儀式性的味道，除了允許描繪案件發生的過程，釐清責任的歸屬外，族中的協調者 (peacemaker) 還會引述文化上類似故事的情節作為先例，提供賠償前做建議參考。最終的賠償可以由加害者提供金錢、馬匹、珠寶或其他有價物品當作象徵性賠償的標的物。通常當個人傷害到其他人，將會造成讓人際關係產生蒙羞，以致於間接造成整個部落跟著一起蒙羞。這般強大的內部社會連帶制約力量箝制著加害者必須選擇賠償一途，同時不敢有再犯的情形發生。

2. 審判圈 (Sentencing Circles)

審判圈是一個以社區導向的司法處理過程，刑事司法體系可以說是社區的同伴關係。換言之，就是將原先在法院審判討論的過程帶回社區情境的現象場 (setting) 來討論。它源自於傳統的印地安人的儀式，參與者包括：被害人、加害者、社區人士、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

警察、社工人員。該制度簡單的說，是由更多專業人加入討論過程，其結論的決定權來自於參與的社區成員。參與者圍坐成一圓圈，彼此互相傳遞意見與討論，有時可以針對事實進行討論以及保證將來應獲得什麼樣的懲罰(punishment)；這裡的「懲罰」包括了：加害者接受諮商輔導(counseling)與服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情緒高漲時，專業輔導人員可以適時介入治療被害者或加害者的情緒。最後所做成的共識性結論及處置方法形成司法判決，在接下來的過程裡，法院及社區均有責任監督加害者實踐結論所要求的事項(陳祖輝，2003：74)。

伍、復歸式正義運用在犯罪預防上的評價

一、促進刑事司法的經濟便宜特性

傳統的應報刑司法係透過象徵性國家的強制力介入，方能懲罰加害者。論及從逮捕、訴訟、審判到矯治這整個過程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來說，均是一筆可觀的數目。重要的是，倘若犯者被關進監獄後，其收容的成本開銷不盡然是符合經濟成本，反倒是成為國民賦稅的負擔(如：增闢監獄)。更擔心的是，如果犯者矯正失敗，在獄中不但沒學好，反而愈染愈黑的話，再犯所耗費的警力與司法系統成本重新啟動來看，實在是看不出有達到懲罰又能減低社會成本支出的景象。復歸式正義的少年司法是一套有效的轉向制度，它在正式司法系統啟動前，先針對屬於高危險

群的偏差少年進行非正式的司法轉向過程，其目的是在減少未來這些偏差少年可能犯下更嚴重的犯罪，耗費更高的社會成本支出。同時，找出偏差少年的犯罪源頭，從其社會人際脈絡底層予以先行矯正、協助，使其能轉而成為社會的一股穩定力量(Lawson & Katz，2004)。

二、日本的犯罪率下降

在日本，特殊的「恥感文化」背景加上有效率的刑事司法體系，使得該國整體的犯罪率成長與亞洲各國相較而言，一直是個犯罪率低、治安良好的現代化國家。日本的復歸式正義作法是：對於初犯與微罪犯者大量實施緩起訴與賠償制度，同時，法官審判的刑度取決於被告是否採取「坦白從寬」的原則(Galaway & Hudson，1996：360—361)。當加害者對被害者認錯、道歉與承擔賠償之責後，容易激發其羞恥的道德直覺，進而內控其個人行為，不致發生再犯。因此，日本的犯罪率之所以會下降在於其司法系統的「前門政策」做得相當落實，包括：學校羞恥感的管理教育、社區的凝聚力、社區警政的犯罪預防政策與個人自我監控的信念培養等，均是讓復歸式正義在日本大受歡迎的原因，成為繼紐澳、北美與歐洲實驗成效良好之後，亞洲第一個推行的國家。

陸、代結論：

復歸式正義有效嗎？限制與未來？

相關實證研究（Hayes & Daly，2003）指出，復歸式正義的轉向制度用於少年司法、觀護的成效明顯優於成人犯的觀護部分，同時也指出，少年犯經過復歸式正義取向的會議、調解之後，再犯情形明顯下降；究其原因，應該與少年的社會化程度算是涉世未深，動之以情，均能觸動內心良知，以及少年事件情節、犯罪動機通常較為單純，所以容易處理。但是，也有研究（莊忠進，2003：67）顯示，復歸式正義的轉向制度許多備受質疑的地方：其一，經濟能力承擔不平等的問題，有錢的犯罪者可能認為賠償視為九牛一毛，無法深刻體會賠償的實質含意。其二，無法強制實施的窘境，復歸式正義的轉向必須取決於當事人雙方都自願且同意的情況下才能發生，加拿大實務上發現，有些處遇者會感到麻煩和沒面子，寧願選擇在監服刑較為簡單。其三，適用性問題，實證研究發現，財產性犯罪與微罪調解成效較佳，嚴重的暴力犯罪和無受害者犯罪（如：吸毒）可能無法達到良好的成效，故而成為該政策的限制所在。其四，調解人的專業問題也備受質疑，例如：警察、地方仕紳這類身份敏感的人容易遭到公信力質疑的問題。調解如果運作不當可能造成被害者二度傷害，拒絕參加調解。因此，未來復

歸式正義的少年司法必須透過立法，審慎考量適合對象。當然在技術層面仍待考慮的重點有：某些罪刑強制納入社區處遇，讓加害者不是認為只有金錢賠償了事，例如：西方某些國家曾對酒醉駕車累犯者，命其在肇事路段架設警告標語，同時要買下報紙或媒體版面向國人道歉；另有服社區勞動，如：倒垃圾或到醫院當義工。其次，調解的品質攸關於雙方和解的意願，調解人的專業素質是否應該採行嚴格的證照制，讓調解結果產生公信力。最後，學校教育應強化恥感的道德教育，平時排解時即可採行協商制度，而非立即的處罰。以當前國內的少年司法制度而言，未來若能審酌復歸式正義的少年司法，在這裡有三點建議：一、從少年事件處理法內容修法起，將屬於保護事件範疇的少年先行作為實驗對象。二、政府應完備中途之家的功能，將其定位成監督少年履行賠償承諾的輔導單位。三、健全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功能，使其成為有完備訓練計畫與執行能力的單位。調解人不可以是現行的地方官派或酬庸性質，應授權由專業人士來負責，社區相關代表組成類似陪審團一起處理少年保護案件。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所博士班研究生）

參考文獻

- 林弘茂（2003）「明恥再整合理論」在學校處理偏差行為之應用，警學叢刊，33（4），75—88，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 許春金（2002）修復式正義的理論與實踐，國立臺北大學主辦之「2002年犯罪問題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 莊忠進（2003）論回復性司法，警學叢刊，33（4），55—74，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 陳祖輝（2003）談應報式正義的轉向—復歸式正義的復出與實踐，法令月刊，54（2），臺北：臺灣英文雜誌社。
- 陳祖輝（2003）論復歸式正義在刑事司法上的意義與實踐，元培學報，9，65—79。新竹：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 楊士隆、林健陽（2001）犯罪矯治：問題與對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 Braithwaite, J. (1989)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 Melbourne, Australia: Oxford Press.
- Bazemore, G. (1996) Three Paradigms for Juvenile Justice, in Galaway, B. & Hudson, J. (eds). (1996) *Restorative Justic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riminal Justice Press, Monsey, NY, U.S.A., 37-67.
- Evans, D.G. (2001) Community Sanctions in Sweden. *Correction Today*, April 2001, 170-173.
- Galaway, B. & Hudson, J. (eds). (1996) *Restorative Justic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riminal Justice Press, Monsey, NY, U.S.A.
- Hayes, H. & Daly, K. (2003) Youth Justice Conferencing and Reoffending. *Justice Quarterly*, Vol.20, Iss.4, 725.
- Hillian, D., Retitsma-Street, M., Hackler, J. (2004) Conferencing in the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of Canada: Policy Developments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Vol.46, liss. 3. Ottawa, 343-367.
- L. Thomas Winfree, Jr. (2004) New Zealand Polic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Philosophy. *Crime & Delinquency*, Vol. 50 No.2, Sage Publications, 189-213.
- Lawson, C.L. & Katz, J. (2004) Restorative Justic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Juvenile Crim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33, 175-188.
- McCold, P. (2001) Primary Restorative Justice Practice, in Morris, A. & Maxwell, G. (eds). (2001) *Restorative Justice for Juveniles: Conferencing, Mediation and Circles*. Hart Publishing, Oxford-Portland, Oregon, 41-58.
- Marshall, T, F. (1997) *Restorative Justice: an Overview*. Home Office.
- Morris, A. & Maxwell, G. (eds). (2001) *Restorative Justice for Juveniles: Conferencing, Mediation and Circles*. Hart Publishing, Oxford-Portland, Oregon.
- Pepinsky, H.E. & Quinney, R. (ed). (1991) *Criminology as Peacemak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 Pranis, K. (1997) Peacemaking Circles. *Correction Today*, Dec 1997, Vol 59, 72-76.
- Price, M. (2001) Personalizing Crime: Mediation Produces Restorative Justice for Victims and Offenders. *Dispute Resolution Magazine*.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Center.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ublished.
- Reno, J., et al. (1998) Guide for Implementing the Balanced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l.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www.glencoe.com/ps/cjustice/article.php4](http://www.glencoe.com/ps/cjustice/article.php4)
- Restorative Justice Knowledge Base. (2002) [Http://www.rjkbbase.org.uk/pages/resourcesl](http://www.rjkbbase.org.uk/pages/resourcesl).
- Retzinger, S.M. & Scheff, T.J. (1996) Strategy for Community Conferences: Emotions and Social Bonds, in Galaway, B. & Hudson, J. (eds). (1996) *Restorative Justic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riminal Justice Press, Monsey, NY, U.S.A., 315-336.
- Seymour, A. & Gregorie, T. (2002) Restorative justice for young offenders and their victims. *Correction Today*, Feb 2002, Vol. 64, Iss. 1, 90-92.
- Turpin, J. (1999) Restorative Justice Challenges Corrections. 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 Inc.
- Umbreit, M. (1998) 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Implications for Crime Victims. The Off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Umbreit, M, et al. (2002) Victim Offender Dialogue in Crimes of Severe Violenc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Victim Assistance.
- Wilson, John, J. (2001) A Comparison of Four Restorative Conferencing Models. *Juvenile Justice Bulletin*. [Http://www.ncjrs.org/html/ojjdp/2001](http://www.ncjrs.org/html/ojjdp/2001)